

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

王 汎 森*

由於我對文化交涉學不曾作過專門研究，嚴格說來，對於這個主題我是沒有任何資格發言的。但是在我的研究經驗中，又對異域史料的價值有一些體會，所以試著以提要的方式將它們寫下來。

首先，我覺得研究任何中國歷史問題，如果能抱持著「東亞交涉」這一個理論自覺，所看到的現象必定有所不同。譬如注意到原先所不曾留意的、複雜的交涉現象，或不再抱持以中國為中心向四周擴散的觀點，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現象。近年來，已經有人從哲學、語言、歷史、思想、藝術等特定角度進行研究。以藝術史為例，我的同事石守謙教授正在領導一個大型研究計畫探索相關問題。在石教授的〈中國與亞洲藝術的再定義〉這份研究提案中，他提到以十三世紀以後的肖像畫及水墨畫為例，可以透過中國部份的還原，一方面顯示日本具有選擇性的引進，以及其後的變化與發展，另一方面也發現中國內部不同區域因此交流之進行而產生的對應發展。其中十三、十四世紀日本所引入的禪師肖像基本上來自文化中心的杭州與蘇州，羅漢圖等儀式所需的道具則取自寧波。它意味著日本在選擇時確有品級的考慮，而且不同品級在日本所起的影響也有所不同。石守謙教授的提案中又說，如果把水墨畫的交流放在東亞的視域中，也可以得到新的了解。雖然在十三、十四世紀因為中日貿易而帶動了寧波職業畫坊的蓬勃，但十五世紀日本水墨畫最大的改變卻與寧波無關，而係因日方重新取得杭州、北京等文化中心的聯繫而來，十六世紀福建地區新興貿易港的出現，則增添了新的管道。但因為中國方面與日本密切交流的幾個地區皆非文人畫的重鎮，所以在十七世紀以前的日本水墨畫中，文人畫並未產生明顯的作用。

我長篇引用了石守謙先生的提案之後，還想說明一點：我們過去通常只關心強勢的、輸出方對於接受方的影響，但我們似乎不能忽略，接受方透過接受或購買的偏好，在受容過程中，替輸出方的文化產業或其他層面進行細微複雜的篩選、改進、重新編碼、或重新創造等形形色色的作用，同時也引起輸出方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s）的調整或重組。

英國史家 John H. Elliott 在一本很小的書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1492-1650* 中提到，¹⁾ 大英帝國向外擴張殖民的過程中，大幅改變了它的新闢殖民地，不過新闢殖民地的經驗也回過頭來影響英國。中國與當時東亞各國的關係與大英帝國不同，但是 J. H. Elliott 所提到的現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1) John H. Elliott,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1492-1650* (Cambridge [Eng.]: University Press, 1970).

象，是不是也發生在當時的中國與東亞各國？也值得深入探考。

我始終牢記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始人傅斯年的名言，研究、史學能擴充史料則得進步，不能擴充史料則不得進步。在東亞交涉學方面，我也想從擴充史料的角度出發，談談新的可能性。

以朝鮮方面的材料為例，過去吳晗的《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已經為從異域文獻中搜羅中國史料立下模範。近年來我翻閱《韓國文集叢刊》、《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燕行錄》等套書，也發現了許多中土所不載、而朝鮮文獻所獨詳的歷史材料。²⁾ 其中又以到過中國的學者文人所留下的記錄，最為可觀。這方面的史料已經被從外交史、文化交流史等角度作過不少研究。以下所要談的是針對目前仍在做的兩項研究，說明東亞交涉史料對研究中國史的其他意義。

近十幾年來，我一直在研究清代政治與文化的問題，迫切需要了解在清代盛世時期士大夫及一般百姓對滿漢之間種族意識的實況。我曾翻查不少清人著作，但因為清代文字獄的壓力太大，一般人對此問題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幾乎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材料。在經過一段尋思之後，我將注意力投向朝鮮使者的文集及各式各樣的《燕行錄》。因為朝鮮使者們曾廣泛地與他們所遇到的北方士大夫或平民對話，一般人對外來的陌生人講話比較直接，而朝鮮使者下筆時又沒有清朝臣民的政治忌諱，所以我推測，如果他們談話的主題與我的關心相近，他們就像是在替我作田野調查一般。如果我們不用文化交流史或政治外交史的角度閱讀這些文獻，而是改換一個角度，用田野調查的角度讀它們，一定可以捕捉到一些迫切需要的訊息。在過去幾年，我已經從各種《燕行錄》及朝鮮文人文集中抄錄了不少材料，大致可以解答這個在清代中國既敏感而又充滿忌諱的問題。

在探討同一個問題時，我也曾閱讀關西大學松浦章教授所整理出版的幾冊《江戶時代漂着唐船資料集》，其中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問答，如果把這些對話轉成人類學的田野問答，可以看出許多在中土史料中所看不到的面相。我相信在清代東亞其他國家（如越南等地）的相關文獻中也可以得到這類材料，而這些都是清代中國文獻中幾乎完全找不到的。

我的另一個經驗是這樣的：在過去十幾年中，我曾陸續寫過幾篇文章，討論近世中國公開省過的傳統，並提到這個傳統的來源之一，是宋代以來「鄉約」中所實行的一種公開記過、省過的方式。宋朝大儒朱熹的《增損呂氏鄉約》中就這樣記載著：

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

於是約中有善者眾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眾，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偏呈在坐。

中國的鄉約有各式各樣的變型，但其中公開彰善糾過的部份，是相當穩定的成份。能否謹守約規

2) 最近我注意到已有《韓國文集集中的蒙元史料》及《韓國文集集中的明代史料》出版。

而被留在約內，是一件事關個人榮耀感及社會地位的事。各式各樣約規的內容及其流變，反映不同地區及不同時代的思潮，非常值得從思想、社會史的角度進行研究。但是我也注意到，過去研究中國鄉約的歷史往往碰到一個瓶頸：即我們很容易看到約條，但很不容易看到實行的紀錄，尤其是其中公開彰善糾過的部份。我常將此現象形容是「食譜」很多，但看不到實際作出的「菜」；連篇累牘的各種約條，只能算是「食譜」而已。

但是我在韓國的鄉約史料中，卻可以找到這方面的資料，此處僅舉一例。在《朝鮮後期鄉約資料集成——靈巖、海南、羅州》中，我讀到〈大同禊行罰錄〉，是一種「記過籍」，³⁾ 例如：

鄭淳芳氏沮敗家產，事係官府，故出契事。有司宋正煥，公事員鄭有鉉，壬子十二月十日。⁴⁾

崔秉性氏所遺夥多，故出契事。乙卯十二月十日，有司鄭淳璟，公事員朴鍾緒。⁵⁾

崔秉植氏、宋喆煥氏室內喪禮時，護喪未恭，故行酒罰事。李鍾氏上全，朱安順上全，金南洙上全。己未四月十六日，有司鄭淳化，公事員宋奎煥。⁶⁾

宋喆煥氏講信之日被酒無禮，動作無儀，故行損徒事。李哲欽氏講信之日，與宋喆煥氏喧嘩失禮，故行酒罰事。崔鶴吉氏講信之日與宋喆煥氏喧嘩，故行笞奴十度事。庚申四月初四日，禊長崔基模，公事員鄭泰鉉，有司宋在基。⁷⁾

崔致鉉氏心志放蕩，沮敗家產，放賣先山，欺人取物而逃在外處，故不可同籍，故行黜契事。辛酉四月十八，公事員鄭淳璟，有司宋在默。⁸⁾

宋在默氏當其有司，不察契規，鄭奎采氏承重喪，哀賻不當給而出給，故行酒罰事。壬戌十一月二十七，公事員崔啓洪，有司鄭得采。⁹⁾

〈大同禊行罰錄〉提供了一種參照性的材料，讓我們知道宋以下中國鄉約中的「記過籍」及在約眾面前公開彰善糾過的情形大概是什麼樣子。

3) 金鎬逸、朴京夏、朴焯、朴鍾彩合編，《朝鮮後期鄉約資料集成——靈巖、海南、羅州》（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97），〈I.靈巖：大同禊行罰錄〉，第307-313頁皆為相關案例。

4) 同上書，第307頁。

5) 同上書，第307-308頁。

6) 同上書，第308頁。

7) 同上書，第309-310頁。

8) 同上書，第310-311頁。

9) 同上書，第312頁。

在我個人的研究經驗中，還涉及到兩種尷尬的場合，而異域史料可以替我解圍。第一是對中國人習而不察的日常生活的觀察與記錄。法國史家米敘烈（Michelet）說到「歷史的緘默」（the null of history），我的理解是指生活於其中的人，因為缺乏一種有意義的距離感，故把生活中的許多東西視為當然、不覺得有記錄的必要。可是對於「他者」而言，往往對它們感到新鮮寶貴，反而提供許多珍貴的記錄。《清俗紀聞》中鉅細靡遺的圖畫，即是一例。第二、異域史料中有時保留一些菁英士大夫所不記錄的地方性文化史料。多年前我在寫一篇論文時，觸及明季江南文化界的一位所謂「妄人」豐坊，在評估各種零星史料之後，我發現我相當倚賴日本僧人策彥的《策彥和尚初渡集》，他不但記豐坊，還記當時地方上的一批小文人小畫家，當時中國的文獻好像不大願意提這些小讀書人。¹⁰⁾

東亞諸國的文化交涉史中，往往為他國保留重要的佚籍、佚文，清末楊守敬編纂《古逸叢書》，發掘了大量中土久已不存的要籍。最近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出版的大元《至正條格》，也是一個驚動元史學界的案例。而我在古勝隆一的《中國中古の學術》書中，也看到對唐朝賈大隱《老子述義》之類佚籍的討論。佚文、佚籍的數量一定比我們想像的多，將來亦必不斷有新的發現。我個人認為，關西大學已故大庭脩的《舶載書目》及《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還留有不少進一步探索的線索。

最後我要提到，東亞諸國間訊息傳遞網絡的形成，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我觀察當時東亞諸國之間的文獻流通、學術思潮之傳播，覺得遠比我過去想像的要快速。我讀古川幸次郎的《元明詩概說》，即頗驚訝於明代中國文壇與日本文壇之密切對話關係。我讀《燕行錄》也發現朝鮮對清朝發生的敏感事件（如呂留良事件），獲得訊息之快速。如果能對這一類現象有更深的探討，必能更清楚地建構近世東亞文化交涉史的面貌。

10) 請參看王汎森，〈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論：豐坊與《大學》石經〉，《新史學》6，4（1995），頁1-20。
“The ‘Daring Fool’ Feng Fang (1500-1570) and His Ink Rubbing of the Stone-Inscribed Great Learning,”
Ming Studies, 35 (1995), pp. 74-91.